

日本女性教习新考

—以与女学堂所生齟齬为视角—

孙长亮（南通大学）

【摘要】日本女性教习是晚清女子教育建构过程中的特殊群体，美国历史学家 *Marius B. Jansen* 称其在清的教育活动为“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以近代化为目标的知识人的大规模移动”¹。她们在各类尚处初创期的中国女学堂实施日式教育模式，对恪守千年且以“卑”、“顺”、“慎”、“德”为准则的中国传统女子教育给予了猛烈的冲击。然而，晚清女子教育虽借镜日本却非亦步亦趋，其中影射于日本女性教习同女学堂间的齟齬，则形塑出中国女子教育对日“崇拜与反抗”并存的双重性格。

【关键词】日本女性教习；女学堂；齟齬；“崇拜与反抗”

提及晚清中国女子教育，便是齐集儒家教化权威对抗近代文明开化、古代标榜伦理吐纳东西教育思潮于一身的矛盾混合体。中、日、洋思想杂糅，传统性与近代化并存建构出这一时期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基本轮廓。甲午一役，满清王朝虽折戟沉沙却反其道而行，忍辱师法日本积极推进日式改革。而此时尚处初创期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也渐趋挣脱“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的封建桎梏，积极仿行日本教育模式，踏出其欲求与男子平等接受教育的第一步。

作为日式教育的推动主体，日本女性教习自然不容小觑。据笔者考证，在清日本女性教习人数达 133 人，她们几乎活跃在中国的各个省份²。正如《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所述：“所谓近世女子教育，盖指我

¹ 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M].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 Co., 1975. 149.

² 孫長亮 「清末中国におけ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の一断面：日本女性教習の活動及びその特色を中心に」『文化共生学研究』2018（17）。

国日本化之女子教育而言，因当时各女学多延日人为教习也”³。近年来，在日本学界如阿部洋、佐藤尚子、加藤恭子等通过网罗、追挖明治期的报刊杂志、机密文书，逐步将日本女性教习的研究课题化，然而从其研究成果中所流露出的却始终是日方对中国女子教育“相扶相助”的高姿态，并未触及在这帮扶过程中与中国女学产生的龃龉。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女子教育的滥觞豫教女学堂以及晚清中国最高的女子教育机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为例，着重考察在其各自实施女子教育过程中与日本女性教习产生何等龃龉，并透过这一龃龉审视、解读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对日“崇拜与反抗”的双重性格。

一、服部繁子与豫教女学堂

服部繁子，东京帝国大学汉学大儒岛田重礼的三女，先后就读于竹桥女学校、成立学舍女子部，日本“贤妻良母”教育之集大成者下田歌子的得意门生⁴。1902年其夫服部宇之吉受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前往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充任总教习，繁子作为随行者一并渡清，据繁子回忆：

明治 35（1902）年 8 月，旧清国政府京师大学堂为实施新式教育，委托我政府遴选教习。政府拍以急电，特命出使西洋中的我夫前往。我夫沿西伯利亚铁路火速归国。……9 月初（我夫妇二人）便抵达北京⁵。

1905 年 4 月，京城女学之风尚未开通，商业家沈绥青决意振兴女学，奉其母命捐银 2000 两，在北京东单牌楼租赁房屋，置备校具等⁶。绥青毫无办学经验，于是通过私人关系拜请服部夫妇，与其共同商议学堂的筹建事宜，豫教女学堂由此诞生。学堂的总经理虽为绥青，但章程起草、教习延聘、科目设置等方面的负责人却是繁子。

³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上海 1927 169。

⁴ 服部繁子「卒業式の回顧」『女学世界』1914 14（7） 53；竹内好・橋川文三『近代日本と中国』（上）朝日新闻社 东京 1974 215。

⁵ 增井経夫整理 服部繁子「秋瑾女士の思い出」『东西交渉』1982 1（3） 38。

⁶ 〈豫教女学堂庆贺万寿并周年纪念会演说〉《顺天时报》 1906-11-27 11-29。

繁子仿照其师歌子的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留学生部办学，起草了《豫教女学堂章程》。据其 3 章 3 条记载，该学堂以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女子为对象，并以造就“贤妻良母”为目的。学堂开设小学程度的寻常科和高等科，修业年限均为 4 年⁷。从开设课程来看，除国语、历史、地理、算术之外，其余诸如家政、裁缝、编物（编织）、造花、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等均为日式科目。师资方面，学堂延聘了李淑贞、林氏二姐妹充任教习；另外，服部宇之吉夫妇通过私人关系亦延聘到佐伯园子、加美田操子、龟田操子等 5 人，初创期的豫教女学堂俨然为一所日式的贵族女学⁸。

但这种“贤妻良母”式的培养理念仅维持 1 年之久就与绥青所期许的女子教育产生齟齬，特别是 1906 年绥青亲赴天津、杭州、上海等处考察男女学堂工厂之后，尤感目前的女子教育方式不尽人意。绥青认为：女学的关系，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以后的“生计”二字，同时需有爱国、爱群之思想⁹。由此可见，此时的绥青已开始关注女子职业教育同国家的紧密性、连带性。与接受教育后再次折返家庭，以做丈夫幕后协助者为旨的“贤妻良母”相比，女子同样可以知技兼得，外出谋生。面对学生日益增多，绥青不但想扩充校舍，还意欲增设女子纺织工厂，开展女子职业教育。正当绥青无奈地小、不足回旋之时，蒙古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施加援手，将乾面胡同的邸宅全行借让给绥青¹⁰。

1907 年春，北京豫教女学堂移至乾面胡同喀喇沁王府内，不仅扩充了学额，还添设织业（纺织）一科。值得一提的是，该学堂创办之初，因学生均出身官绅望族，所以“性格强硬，喜好议论，如有不平之事，每每结盟休学”¹¹。自织业科设置之后，学生的招募范围不再局限于中上流家庭，家道实系贫苦的也可报名，并由堂中筹备一切用项¹²；另外，

⁷ 〈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东方杂志》 1906-1-19 2（12） 336。

⁸ 孙长亮 〈清季日本女性教习拾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29）。

⁹ 同注 6。

¹⁰ 〈补记豫教女学堂开纪念会事〉《顺天时报》 1906-12-2 12-4。

¹¹ 服部繁子「支那婦人の特質」『女学世界』1912 12（7） 33。

¹² 〈参观豫教女学堂新设织业科记言〉《顺天时报》 1907-5-29。

学堂会根据学生所学手艺的高低给与相应奖励，对学算精通、学业出众的，可派充场内女司事，亦可推至正司账等¹³。关于师资，学堂一改以往日本教习几乎垄断的情况，邀请京城工艺官局女工科的教习前来协助。

至此，豫教女学堂在进行日本“贤妻良母”教育的同时也着力向女子职业教育倾斜。尽管服部夫妇认为：“男女天分本非一致”，应“以男之长补女之短”，故“中国女子教育必以造就贤母良妻为目的”¹⁴。但在绥青看来：国家需独立富强，居中国人口一半的二万万女子切不可漠然视之，毕竟“女子要是有了能耐，大小可以经营一个事业，彼此大家都知道刻苦立业，还愁国家人民不能自立吗”¹⁵。

可惜好景不长，至1908年春，豫教女学堂已垫赔1万余金难以维持，加之喀喇沁亲王携同家眷回京，学堂所借用的府邸需及时返还。有人曾劝其停办，但绥青却说：“无论怎样为难，这学堂万不能半途而废，只要一息尚存，此志决不懈怠”。怎奈时乖运舛，沈君虽一再广募经费、寻找城内的空置府第，但最终未遂心愿，历经近3年的豫教女学堂只能唏嘘闭堂¹⁶。

二、服部升子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

服部升子，福岛县生人。福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01年入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继续学习。1904年10月升子渡清来京，后经服部宇之吉、公使馆推荐，入豫教、淑范两学堂充任教习。升子在华10余年，1914年因父病重归国，后任日华学会主事，负责在日中国女子留学生事务，直至1937年5月方才退休。1934年9月日本外务省授予升子“社会事业功劳者表彰状”，被日本盛誉为“在日中国留学生

¹³ 同注6。

¹⁴ 服部宇之吉《女学传习所开学演说》《学部官报》4（转自《学部官报》影印版第一册 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湾 1980 103）。

¹⁵ 同注6。

¹⁶ 《豫教女学堂最近事》《顺天时报》1908-4-22。

之母”¹⁷。然而，据奉天女师首届学生富香海回忆，这位有如此经历及殊荣的人物其实却与奉天女师龃龉重重，值得再考。

1906年奉天提学使张鹤龄向盛京将军赵尔巽呈递奏折《女学宜正规师范也》，主张女子教育应仿效日本，且“以造成贤妻良母为目的，以培养淑德美术为本”¹⁸。随即赵尔巽命令奉天学务处速设女学堂用以培养女教师资，同年7月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成立。建校之初，学堂设简易、工艺二科，募集学生60余名。王书铭任学堂总理，章云卿、吕眉生分任监督、教育长等职。如前文所述，在师法日本的背景下，1908年2月升子受聘奉天女师，月俸150银元，教授日本語、体操、唱歌、手工艺等科。不久奉天女师借迁址之机又添设蒙养院，在升子的建议下，蒙养院完全参照日本国内的最新样式办学¹⁹。

与繁子襄助豫教女学堂相比，这位高薪延聘的升子可谓既不勤于教书也不负责育人，据富老回忆：

音乐（升子）不会中国话，学生也听不懂日语。上课时，她在黑板上先将乐谱划出，这起码要20分钟，然后教学生用7音节念乐谱，这一堂课就算过去了。下一堂课仍然念乐谱，直至念熟，再按谱教歌。但歌曲是日本词，学生多不懂，只按教员音调跟着空喊而已。（升子）教了2年半，学生学会的歌曲不到30首，而且不懂歌曲内容。

日文 这门课学习什么，因我是学习英文的不详细，只记得英文班停课，日文课也随之终止，学生学习外文4年半，占用时间300多个钟点，结果是一无所获。

体育 上课时，只学站排、看齐、报数、立正、便步走。

手工 无正式课本，每次上课时（升子）提出这节课要学什么，

¹⁷ 青鉛筆の記者「支那留学生の母 服部升子女史」『婦選』1932-1-1 6（1） 79；「日華學會主事服部升子退職齊藤甲一ヲ囑託ニ採用ノ件」、「昭和九年七月 服部升子へ社会事業功勞表彰狀転送ニ関スル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37 编号：B05015267600 B05015013200。

¹⁸ 〈赵尔巽全宗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微缩文献 档号：178。

¹⁹ 富香海〈创立时期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文史资料选辑》5 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阳 1965 123。

然后示范并说明操作方法，学生就依照示范、学习，无甚理论²⁰。

然而对于这种情况，校方虽心知肚明，却一再忍让无人敢出头挑明，因恐犯下“干预国政”之罪。2年半后，学生们实在忍无可忍便向校方提出撤换的要求，校方却说升子是日本政府从其国内聘请而来，订有3年合同，聘期未满不能辞退。随后学生又以不管外交之事，学堂应对学生的宝贵光阴负责为由继续施压，校方无奈才申请更换。据说当升子收到解聘通知时，依旧无理辩驳，认为强迫辞职必须由两国政府交涉。最后学堂还是按照3年合同付给薪俸，此事才算作罢²¹。

三、“崇拜与反抗”之双重性格的形塑

（一）无奈之崇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中接连获胜，10年之间一跃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对其态度也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并意欲通过学习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纵观晚清中国女子教育的建构过程，正是在此“师法日本”的旗帜下逐步推进的。

明治日本自1872年颁布《学制》以来，国民教育日臻完善，至豫教女学堂成立的1905年，日本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3%，基本完成国民皆学的任务²²，而此时的中国女子毫无教育可言，据《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所示，1907年全国女学生共计11,936人，女子初等教育普及率不到0.06%，实在难与日本相提并论²³。不用说近代文化女性，即便是稍具近代知识的女子也实属凤毛麟角。同时受千年“男女之大防”的影响，女学堂延聘男教习为伦常乖舛之举，一度出现“古有玄德三顾孔明，而今虽千顾，女性教习仍不可得”之场景²⁴。如此背景下，日本女性教习应运而生，这些贴有“近代文明开化”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

²² 佐藤尚子·大林正昭『日中比较教育史』春風社 神奈川 2002 172。

²³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 台湾 1989 42。

²⁴ 服部宇之吉「清国の教育実態」『帝国教育』321 1909-4-10(转引自『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 中国の部 2』龍溪書社 2002 351)。

标签的女子通过私人延聘抑或清廷官雇方式渡清从教，她们不仅是日式教育的传播者，更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直接推动者。与同学堂的中国教习相比，日本女性教习待遇优厚、地位颇高，很多都亲自参与学堂运营、教学设计等，正因为如此，她们也理所当然的成为被崇拜的对象。除教育者身份之外，有的教习甚至还兼有医生之责，因为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中，她们确无所不能。如最早渡清的河原操子不仅是毓正女学堂办学的主要负责人，还时而为科尔沁王府附近的居民们看病²⁵。另据自流井树人学堂山根花子回忆，一女学生突患眼疾，缺席2、3日，恳请花子治疗，而花子只是携带一瓶日本眼药前往，就治好了这名学生的眼病；甚至还有一名女学生将鱼骨卡入喉中，也寻求花子的帮助，花子教其大量吞咽饭粒，不久问题就解决了²⁶。

（二）质疑之反抗

然而从本文所举两例可知，晚清的中国女子教育虽师法日本，但也并非一味鉴仿，而是在“崇拜与反抗”中逐步摸索自我前行之路。如果说崇拜是源于初创期中国女学因办学经验、女教师资欠缺的无奈以及对近代文明的渴求，那么反抗所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对日本女子教育的不断质疑。这种质疑既有表面上因教学态度不端、语言不通、教学效果低下而出现的“教与学”间的龃龉，如升子与奉天女师；也有背后中日两国因女子教育理念不同而出现的根本性龃龉，即：日本的“贤妻良母”教育理念是否真正适应晚清国情。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奉行“贤妻良母”教育指针，并于1899年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日本女子可谓是在安定的国内环境中接受此种教育。但与之相对，深处内外交困的满清中国显然不具备如此优厚的条件，加之同时期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导入、自身人权意识的增强，与接受教育后折返家庭的“贤妻良母”相比，中国女子更被鼓励应踏出家门、接触社会，与男子一同建设国家。

²⁵ 邢复礼 〈清末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在科尔沁的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15 内蒙古文史书店 内蒙古 1984 118。

²⁶ 「清国の内部は未だ開けず」『読売新聞』1909-2-15。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师法日本的实质所在，毕竟师法日本只是中国领略“西方精神”的手段，日本仅充当跳板的作用。换言之，取道日本获取近代知识进而间接学习西方才是中国最终的学习目的。毋庸置疑，中国在学习日本过程中所汲取的“贤妻良母”教育理念并非属于西方，笔者认为，这种理念是日本以传统儒教女子教育观为底色糅杂本国以及近代西方女子教育要素后的“中·东·西”折衷复合体，1907年清廷学部仿日颁布《女子学堂章程》之时其实也正是看重日本“贤妻良母”教育亦含传统儒教的“女德”、“母道”特质。但即便说这种复合型的“贤妻良母”理念具有近代性格，也与近代化有着本质区别。事实证明，明治末期欧美文学中自我主义、自然主义风靡日本，受其影响的日本文学界将“贤妻良母”视为“男性本位主义”的教育模式，不断加以抗议与抨击²⁷；民国时期国民大学教务长黄达生曾对1908年的日本女子教育现状做如下回忆：日本女子，除皇族华族外……以得职业为荣。其铁道、邮局、电局，女子服务者颇多。特如铺店，及游艺场为尤夥²⁸。

由此可见，“贤妻良母”教育理念在其发源国日本尚且无法实现，更不用提时值革命前夜的中国。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照抄照搬仅为一时之策，并非长久之计，谋求发展还需结合自我实际切实思虑。至于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对日“崇拜与反抗”之双重性格的形成，应该只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吧。

参考文献

1. 富香海 〈创立时期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 《文史资料选辑》5 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阳 1965。
2.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上海 1927。
3. 黄遵三 《三十年日记 第一部留学日记》湖南印书馆 长沙 1933。
4. 卢燕贞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 台湾 1989。
5. 孙长亮 〈清季日本女性教习拾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29)。

²⁷ 桜井役 『日本教育史』③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東京 1981 167。

²⁸ 黄遵三 《三十年日记 第一部留学日记》湖南印书馆 长沙 1933 132。

6. 邢复礼 〈清末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在科尔沁的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15 内蒙古文史书店 内蒙古 1984。
7. 阿部洋編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 中国の部 2』龍溪書社 東京 2002。
8. 孫長亮 「清末中国におけ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の一断面：日本女性教習の活動及びその特色を中心に」『文化共生学研究』2018(17)。
9. 桜井役 『日本教育史』③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東京 1981。
10. 佐藤尚子・大林正昭 『日中比较教育史』春風社 神奈川 2002。
11. 竹内好・橋川文三 『近代日本と中国』(上)朝日新聞社 東京 1974。
12. 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M].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 Co., 1975。
13. 《东方杂志》 1906-1-19 2 (12)。
14. 《顺天时报》 1906-11-27、11-29、12-2、12-24、1907-5-29、1908-4-22。
15. 《学部官报》(影印版第一册) 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湾 1980。
16. 〈赵尔巽全宗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微缩文献 档号:178。
17. 『読売新聞』 1909-2-15。
18. 『东西交渉』 1982 1 (3)。
19. 『妇選』 1932-1-1 6 (1)。
20. 『女学世界』 1912 12 (7)、1914 14 (7)。
21. 「日華學會主事服部升子退職齊藤甲一ヲ囑託ニ採用ノ件」、「昭和九年七月 服部升子へ社会事業功勞表彰状転送ニ関スル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37 编号: B05015267600、B05015013200。